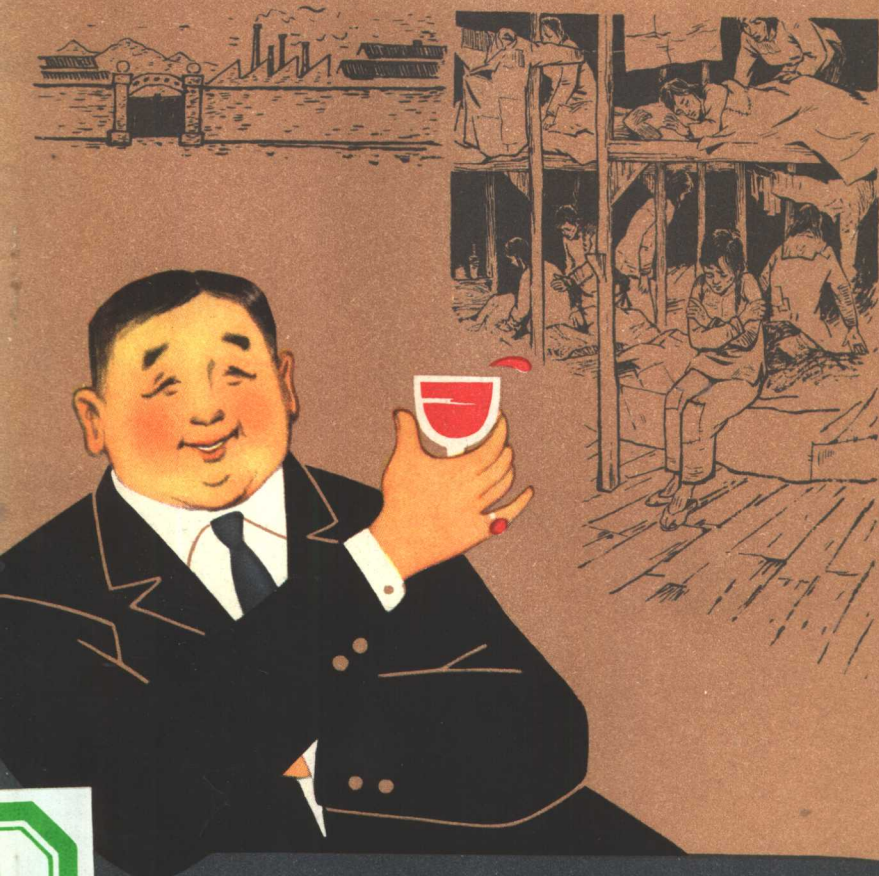


ZAI ZIBENJIA DE XIAOLIAN HOUMIAN



在资本家的笑脸后面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在資本家的笑臉后面

ZAI ZIBENJIA DE XIAOLIAN HOUMIAN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北京·1964

在资本家的笑脸后面

赵隆义插图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、出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85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2印张 28千字

1964年4月北京第1版 1964年7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150,001—250,000 定价(3)0.15元



告少年讀者

亲爱的少年朋友，你生在新社会，长在紅旗下，恐怕还不知道旧社会是什么样子吧？

旧社会是剝削階級剝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社会。旧社会有哪些剝削階級？剝削階級怎样剝削和压迫劳动人民？剝削階級为什么能剝削和压迫劳动人民？这些，你一定很想知道吧？我們打算編一套書，来給大家講講这些事情。

这套書共有八本，其中四本是通过真实的故事來說明問題的。这四本書的書名是：《万恶的地主階級》《禍国殃民的蔣家王朝》《罪恶滔天的帝国主义》和《榨取工人血汗的資本家》。另外四本，是揭露剝削階級剝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真实故事，是前四本的輔助讀物。

这一本《在資本家的笑脸后面》，就是《榨取工人血汗的資本家》的輔助讀物。你看了《榨取工人血汗的資本家》，再看看这本书，就会进一步了解資產階級的丑恶本質。同时，你把新社会和旧社会做个对比，就会更加热爱社会主义，更加热爱共产党，更加热爱毛主席！

編 者

1963年12月



目 次

人間地獄	张文升 刘振华	5
包身工的苦难	王緒生	10
徒工泪	多兴云	19
鞋的故事	张緒波	24
女工苦	祝生秀	28
我的遭遇	张紹琴	32
在資本家的笑脸后面	紀 哲	36
一个电工的惨死	唐殿元	42
十四条人命	何福仁	48
不同的晚年	周阿巧	51
王子哲的发家史	霍 斌	55
苦难中的斗争		59

告少年讀者

親愛的少年朋友，你生在新社會，長在紅旗下，恐怕還不知道舊社會是什麼樣子吧？

舊社會是剝削階級剝削和壓迫勞動人民的社會。舊社會有哪些剝削階級？剝削階級怎樣剝削和壓迫勞動人民？剝削階級為什麼能剝削和壓迫勞動人民？這些，你一定很想知道吧？我們打算編一套書，來給大家講講這些事情。

這套書共有八本，其中四本是通過真實的故事來說明問題的。這四本書的書名是：《萬惡的地主階級》《禍國殃民的蔣家王朝》《罪惡滔天的帝國主義》和《榨取工人血汗的資本家》。另外四本，是揭露剝削階級剝削和壓迫勞動人民的真實故事，是前四本的輔助讀物。

這一本《在資本家的笑臉後面》，就是《榨取工人血汗的資本家》的輔助讀物。你看了《榨取工人血汗的資本家》，再看看這本書，就會進一步了解資產階級的丑惡本質。同時，你把新社會和舊社會做個對比，就會更加熱愛社會主義，更加熱愛共產黨，更加熱愛毛主席！

編者

1963年12月



目 次

人間地獄	张文升 刘振华	5
包身工的苦难	王緒生	10
徒工泪	多兴云	19
鞋的故事	张緒波	24
女工苦	祝生秀	28
我的遭遇	张紹琴	32
在資本家的笑脸后面	紀 哲	36
一个电工的惨死	唐殿元	42
十四条人命	何福仁	48
不同的晚年	周阿巧	51
王子哲的发家史	霍 斌	55
苦难中的斗争		59



人間地獄

解放前，天津有一个裕大紗厂。这个厂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、大汉奸王克敏开的。王克敏为了更多地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，派狗腿子王相林到河南、河北和北京等地方，招收了很多十几岁的孩子当童工。

那一年，我刚十二岁，整天跟着媽媽在村里要飯。媽媽听說来了招工的，又管吃又管穿，就把我托給了招工的。不多日子，我、我表弟和村里好些穷人家的孩子一起到了天津。听說那一回王相林一共招了八百多个孩子。

进厂以后，我們被交給了工头朱胖子。朱胖子手里提着一根上头粗下头細、头上有一个銅疙瘩〔gē da〕的棍子，他把眼一瞪，恶声恶气地要我們排好队，在“志願書”上按手印，然后换上一身灰衣褲。連休息也不讓休息，就押着我們上工去了。

每天天不亮，汽笛就像鬼叫似的催我們起床。我們一天要做十几个小时工，累得总是睡不够，常常听不見汽笛叫。这时候，朱胖子偷偷走进来，把我們从被窝里一个一个揪出来，劈头盖脸地一頓打，一面打，一面問：“吃‘片湯’（板子），还是吃‘面条’（棍子）？”話音刚落，就进来两个工头，給我們每人四十棍子，痛得我們“媽呀，媽呀”直叫喚。打过



了，还要我們跪在砖头上，直到上工的汽笛响了，才赶着我們去上工。

这样的折磨，十几岁的孩子怎么受得了呢！我們天天想家，想慈爱的父母，誰都想逃出去。可是，我們住在厂里，从来不許出門，連大門朝哪里开也不知道，怎么逃得掉呢？

一天夜里，外面靜悄悄的。童工刘小宝哭着对一个小伙伴說：“咱們跑吧！”

小伙伴說：“围墙这么高，怎么爬得出去呢？”

他倆想呀，想呀，后来那个小伙伴說：“你踏着我的肩膀爬出去吧！”

刘小宝看了看小伙伴，說：“那你呢？”

“我再想办法。快点，一会儿朱胖子来啦。”

他們倆摸到了围墙根。刘小宝踏着小伙伴的肩膀，翻过围墙逃跑了。

刘小宝跑出来以后，还没有走过几条街，就給警察看見



了。警察見刘小宝穿着裕大紗厂的灰布衣服，就知道他是偷跑出来的，馬上把他抓住押回紗厂。

朱胖子見了刘小宝，两眼一瞪，立刻叫人把他吊在树上，抡起板子，劈劈啪啪毒打了四十下，打得刘小宝死去活来。

刘小宝挨了这頓毒打，不能起床，沒有飯吃。有一天，同屋的一个小伙伴，偷偷給他拿了块饽饽[bō]，不料給朱胖子看見了。朱胖子一把把他抓过去，瞪着贼眼說：“好呀！你是連吃帶偷，今天我讓你吃个够！”說完，就叫了两个工头，一个按着那童工的头，一个按着腿，他上去就是一頓狠打，打得那童工爹呀媽呀直叫。从此，朱胖子便規定，童工們吃过飯以后要挨个儿搜[sōu]身。

不久，刘小宝就給送进“八間房”去了。送进“八間房”就是活活等死呀！

“八間房”在工厂右边的一个小院里，东边四間，西边四間。院子里长滿了野草，阴森森的，真叫人害怕。房子里只有几块破板子搭的床，别的什么也沒有。誰要是給送进了“八間房”，就是不病死，也得餓死。死了就被抬到一块叫“艺徒坟地”的乱葬崗上埋掉。每天都要从“八間房”里抬出去几个死孩子。童工“犯”了法要給送进“八間房”，要是生了病，病倒了，也要給送进“八間房”。所以大伙儿都提心吊胆，怕工头找碴儿，也怕生病。

可是，长期过着又累又苦的生活，誰能保住不生病呢？果然，我的表弟生了脓疱疮，滿身是白泡，痒得厉害，一抓就

流黃水，黃水流到哪儿，就爛到哪儿，後來爛了一臉一身，就病倒了。我和表弟蓋一床被，我也傳染上了。我們兩個人躺在潮濕的工房里，沒有東西吃，又餓又害怕。

那曉得沒躺上幾天，朱胖子帶着人進來了，我們吓得像傻子一樣，渾身直打哆嗦，說不出一句話。只听朱胖子對跟着的人說：“看樣子一半天干不了活，干脆，送‘八間房’算啦！”

他剛說完，就過來兩個人，要把我和表弟抬走。我吓得苦苦哀求，可朱胖子像沒有聽見一樣。

這時候，站在朱胖子旁邊的一個人指着我說：“朱先生，這個孩子病輕，讓他留兩天看看吧。”



朱胖子就叫人把我表弟拖走。表弟掙扎着說：“朱先生，我還能活，別……送啦，行行……行行好吧。”朱胖子連理也不理，叫人把他抬走了。我望着表弟兩隻手在空中亂舞亂抓，哭着喊着被抬出工房，心像刀扎了似的，也禁不住哭起來了。

從那以後，我再



沒有見到表弟。他和所有被抬進“八間房”的童工一樣，也連病帶餓，活活地被折磨死了。

不到三年，我們一起來的八百多個童工，就這樣被折磨死了五百多個！

這些孩子的父母，在家里天天盼，年年盼，盼望着自己的孩子早些回來。盼了好幾年，沒有一點音訊，有的就向地主借了高利貸〔dài〕，或者賣了東西趕到紗廠來看孩子。要跑好幾趟，才能見到王相林。見了面，他只淡淡地給一句話：“走吧，你孩子得病死了。”

活生生的孩子，這麼不明不白地死了，做父母的哪有不傷心的。可是，那年月，是剝削階級橫行的天下，到哪里去訴苦，到哪里去申冤啊！

解放以後，“八間房”拆了。在那塊地方，蓋起了我們棉紡三廠的俱樂部；“藝徒墳地”那塊地方，修起了第二工人文化宮。這些在舊社會里哭聲淒淒、陰風慘慘的地方，現在充滿了歡樂的歌聲、愉快的笑聲。但是，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這里曾經埋葬過童工們的尸骨，永遠不會忘記資本家和他們的狗腿子怎樣折磨死了好幾百個童工！

國營天津棉紡三廠 張文升 劉振華

包身工的苦难

国营上海第十二棉紡織厂的潘年芳阿姨解放前做过包身工。这里講的，是她和别的包身工的苦难。

潘年芳阿姨生长在江苏省泰州乡下，她家有八个人：爷爷、爸爸、媽媽，一个妹妹、三个弟弟和她一家这么多人要吃要穿，可只种着两亩祖宗留下来的坟地和向地主租来的三亩薄地。她爸爸白天給地主家推車挑担，晚上披星戴月下地干活。一年到头这么辛苦，到头来，交了地主的租，就剩下几顆粮食，全家人还得挨餓。住的两間破草屋，牆是草泥糊的，門是蒲叶編的，四处透风，穿的盖的更不用說了，破破烂烂，遮不严盖不暖。

1934年夏天，潘年芳阿姨的家乡遭了大水，她們一家人有的爬在树上，有的坐在木盆里，过了七天七夜。她媽媽正怀着孩子，受了这番折磨，不久就死了。

遭了这一場天灾人祸，她家的日子更难过了。

有一天，村里来了个戴銅盆帽、穿綢长袍的陌生人。他說他是上海一家紗厂的带工老板，特地到农村来招工的。他見了人就說：“嘿，到上海做工可好啦，进大工厂，住洋房，吃白米飯……三年以后，工錢全归你們自己。”

大伙儿听得有点半信半疑。



有个人問他：“跟你去有啥規矩？”

他說：“吃包飯，听老板的話。沒別的。”

“一年給几个錢呢？”

“一年不包。要包得包三年。一年給十塊錢，先付五塊。怎么样？”

潘年芳阿姨的爸爸，看看倒塌的草房，看看一片水汪汪的庄稼地，又看看站在一旁的全家老少，心动了。他对那带工老板說：“先給五塊錢太少了，多一些吧！……”

带工老板冷冷地說：“那不行，說五塊就是五塊，規矩不能破。你家不願意去，拉倒，願意去的多着呢！”說着，他故意装出立刻要走开的样子。

这时候，站在旁边的十二岁的潘年芳着急了，她噙[qín]着眼泪，央求爸爸說：“爸，五塊就五塊，讓我去吧。有了这五塊錢，也好买点粮食活命呀！”爸爸用顫抖的手撫摸着年芳的头，眼泪落到了孩子的头上。

事情說妥当了，带工老板拿出一张包



身契[qi]，要潘年芳阿姨的爸爸在上面按手印。包身契上写着：在三年里面，潘年芳就是他带工老板的人了，不听話要由他打，由他罵，打死也不償命。

等潘年芳阿姨的爸爸按了手印，带工老板掏出五块钱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现在小姑娘卖给我啦，钱收下吧。”

当天晚上，潘年芳阿姨和前村后村一共十个小姑娘，乘上船，由带工老板带走了。

潘年芳阿姨到了上海，开始过着又一种苦难的生活。

清晨五点鐘，她和一百多个农村姑娘站在紗厂围墙旁边等着工厂开门，登記上工。这一百多个姑娘和她一样，也是带工老板从农村买来的。

九点多鐘，厂門开了，开始写“号头”（就是登記做工）了。資本家的狗腿子，把她们当商品一样地挑来挑去。长得矮小的不要，太瘦的也不要。

潘年芳阿姨生得矮小，沒有被挑上，只好回来了。她走到带工老板的家門口，老板娘見了她就問：“号头写上沒有？”潘年芳阿姨胆怯地搖了搖頭。老板娘抓起板凳，就朝她头上摔过去。板凳角砸破了潘年芳阿姨的头，顿时鮮血直流。

打一頓并沒有了事。带工老板哪里会让一个花了五块钱买来的“活工具”白白吃閑飯呢。带工老板要她烧飯，洗衣服，拖地板……，稍稍不如意，就拳打脚踢。潘年芳阿姨的身上从来沒断过伤。